

# “天下千钧我半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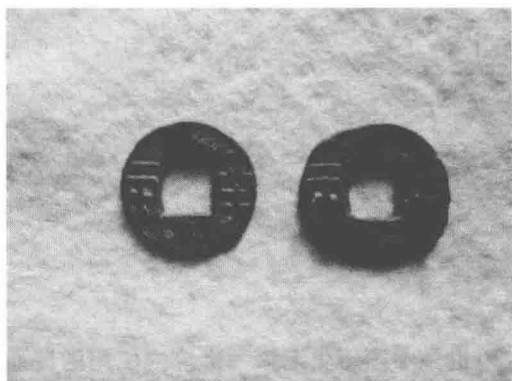
“半两”是秦代铸钱的名字，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统一使用的流通货币。半两等于十二铢，铢是当时最小的重量单位，成语“锱铢必较”、“铢积寸累”就是形容“铢”的轻微之处。因此，“半两”也是当时最小的流通货币单位，犹如今日的“一分钱”。

我们知道，秦代戡平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大乱，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春秋战国时代，虽然没有近代“少数民族”这个概念，但中原诸国的统治者逐渐认识到了自身和边疆少数民族的差异，在他们看来，中原土地肥沃、人口繁盛，而周边的少数民族地区则气候严酷、物产稀少。

用当下的眼光看，“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这八个字无疑具备对其他民族的侮辱性，但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当时朴素、原始的民族观。中原地区的统治者态度若此，周边少数民族更难以获得文化交流、经济互市的机会了。

与中原诸国相比，秦国地处西北，与西部、北部的少数民族交往颇多，因此秦国历代君王并不歧视周边少数民族，相反，他们非常重视西北边陲的陆路出口，并且尝试着与中亚、西亚地区的国家、民族进行文化交流。秦国的历史很短，丝绸之路与出使西域的历史重任根本没有办法实现，最终落到了汉朝皇帝的身上，这是后话。

但秦统一六国之后，对于文字、车轨、度量衡与币制统一，则昭示了



其怀柔天下、全国一盘棋的发展政策。我个人认为，在这“四大统一”当中，最重要的统一乃是币制的统一，这意味着秦始皇对于全国这个开放性市场的重视，并且大大地繁荣了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简

而言之，毕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货币统一才是惠及天下的利民政策。

现在许多研究经济史的学者认为，汉代所呈现出的大繁荣，与文、武两帝的“休养生息”、“重农抑商”的政策有关。而我却认为，研究历史不可忽视其延续性，“文景之治”的实现与秦代币制统一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秦代在全国性范围内建立起了统一、有序的货币秩序与市场文化，汉代乃是对这一秩序与文化的继承——譬如汉代所推行的“五铢钱”在本质上是对“秦半两”这一货币制度的发扬与肯定。

在秦汉时代，少数民族与汉族的交流最为频繁。既有战争，也有和亲，既有互市，也有出使，和东周列国处理少数民族的关系有着云泥之判，这与撒遍全国的“秦半两”密不可分。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小国的币制极其混乱，有刀币、铲币等几十种，仅一个齐国就有上百种币制，而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甚至还有“以物易物”、“以人易货”的奴隶制交易。毋庸置疑，唯有当经济发展的政策打破民族、文化的壁垒之后，人类才可以共同地进入到文明世界。

因此，当下仍需反思“秦半两”的意义与价值：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扶持，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鼓励其融入全球化的现代市场当中，

这是鼓励其坚守自身文化的前提。在这个进程当中,或许会有一些少数民族感受到强烈的竞争压力,但长远地看,这不但对其经济繁荣有利,也有助于其文化发展。

说到底,这就是要“输血”还是要“造血”的问题。在一个“世界性”的年代里,“民族性”并不能成为抗拒全球化的挡箭牌。相反,“民族性”何以融入全球的市场,形成自身的文化、经济优势,并找准自己的国际定位,才是少数民族在今后获得发展后劲的关键。抱残守缺、“等靠要”都不利于少数民族长期、稳定的发展,只有积极地融入“全球一盘棋”的大格局与具备“一起切蛋糕”的勇气,才可以获得长远的发展空间。

据说,铜钱上的“半两”二字是秦朝丞相李斯的书法,而“天圆地方”的“孔方兄”格局也是由“秦半两”开了先河。法家代表人物李斯是主张民族融合的,“天圆地方”则预示了当时中国人最为简单的世界观,意味着普天之下可以一起发展,事实上“秦半两”确实也收获到了当时秦始皇与李斯想要的结果。今日重新反思这段历史,对于当下民族政策的研究显然大有裨益。

“天下千钧我半两”是清代诗人严我斯对秦代币制的历史评价,窃以为此说非常在理。“半两”虽小,但却有着兼济天下、造福黎民的重要价值。就目前收藏界而言,“半两”属于非常多见的一种古币,在全国范围内都可以见到。我曾在新疆的文物市场见到过多枚出售的“半两”,锈少且字浊,乃由当地干燥气候多年风化使然。可见“半两”在当时的西域也广泛流通,其造福民族融合、共同繁荣的历史之功,理应为后世所铭记。

# 治乱尽五铢

秦代的“半两钱”并没有推行多久，秦朝就覆灭了。一枚半两钱就等于半两（即十二铢）银，这是一般等价物在中国的早期雏形，与先前的贝币、布币与刀币相比，这是历史上一次极大的进步。不但开创了铜铸面值币与贵重金属等价的原则，更统一了全国的货币流动，促进了中原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共同繁荣，所以说，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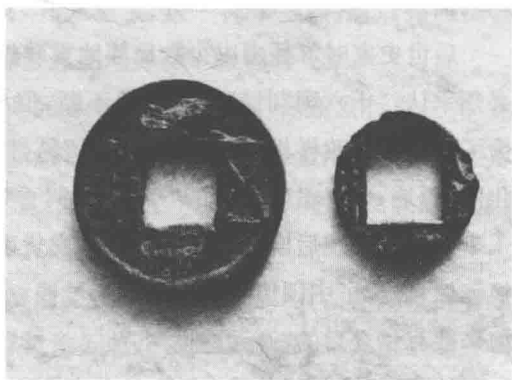
前面说过，半两等于十二铢。秦灭之后，汉代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物价回落，国库充盈。尤其到了汉武帝时期，粮仓里的米多到烂掉，金库里的铜钱多到腐烂成铜球，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尽管当时“半两”还在沿用，但明显由于当时通货萎缩，“半两”已经成了“大票子”，在这样特殊的情况下，汉武帝下令：回收半两钱，重铸“五铢”——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沿用了七百余年的“五铢钱”，它见证了从文景之治、王莽篡政、三国演义、两晋之乱直至风云突变的十六国时期，堪称中国古代史中乱世与治世的见证者。

单论钱币的重量而言，半两与五铢差不多。但若从一般等价物的角度来看，“五铢”只相当于“半两”一半还不到的兑换量。可见汉代以农商为主体的经济已经达到高度繁荣的地步。而这无疑与汉代及其后来统治者科学、积极的民族政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沿袭秦代大一统格局，汉代统治者开始将大量的经历放到了边疆、民族事务上。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汉朝君主采取三种方式：一为

和亲,即将宗室女、宫女嫁与少数民族首领,使得民族问题变为家庭问题,少数民族首领“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这大大促进了边疆的稳定与发展;二为遣使,以张骞、苏武为代表的使臣,前往少数民族地区谈判,主要目的是阐明中央政府的政策,力图促进中原地区与边疆地区的互市与文化交流,譬如采取“开放关市”的形式,实现中原与边疆的经济交往,“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无干戈之役”的结果,既是中原统治者所期望的,也是边疆少数民族首领愿意看到的局面。

另外一种就是战争,对于危害边疆稳定,骚扰边关的部分少数民族部落,汉朝统治者采取了“集中打击,有效震慑”的策略。譬如“北击匈奴”战役中涌现出的名将卫青、霍去病、李广、班超等人,成为中外



战争史上的名将。在西方军事史上,这些“抗匈名将”与屋大维、卢库鲁斯等人齐名。而且,匈奴太子金日磾还以俘虏之身,在汉朝做到了托孤大臣,《汉书》以“忠信自著,勒功上将,传国后嗣,世名忠孝”十六字盖棺论定,开创了少数民族人士担任“中央高级干部”的先例。

综合来看,自汉以后至唐六百余年中,中原统治者对于边疆少数民族的政策是对汉朝政策的延续。大体不过三件事:和亲、遣使与战争。但总体来看,依然是宽厚为主。譬如诸葛亮“七擒孟获”这一传奇故事就证明了这个问题。在这样的政策下,晋代继承了汉代的政策,陆续提拔少数民族首领进入中央中枢,譬如拥戴司马睿登基的“十臣”中,慕容廆、段匹磾等鲜卑族首领就占了七席。

由于这样紧密的联系与互动，及至南北朝、十六国时期，匈奴、鲜卑、羯、羌与氐等五大北方游牧民族开始陆续进入中原，甚至开始建立属于自己的地方政权——这构成了少数民族区域自治的先河。比起春秋战国时期的“胡服骑射”来说，这已经是从量到质的飞越了。

在这几百年里，“五铢”实际上是通用货币。无论是大一统的“治世”汉代和西晋，还是逐鹿中原的“乱世”三国、十六国，从江南到漠北，“五铢”一直在通用。这反映了在民族大融合的七百年里经济指标相对稳定的局面。

后世史家时常抨击以少数民族地方政权为主的“十六国”之乱，我们必须承认，“十六国”时期虽然战争不断，但后赵的“劝课农桑诚有道”成为了后世的施政样板；前燕兴起边境贸易，使得首都姑臧成为了“河西文化”发源地；成汉王朝颁布的“事少役稀，百姓富实”造福了一方百姓；汉王李兴敏锐发现后期“五铢”所带来滥发货币的危害，改铸的“汉兴钱”替换五铢，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年号钱。试问没有这样的耕耘、积累，何来数百年之后的“开元盛世”？

从“汉五铢”到“北魏五铢”，这枚印刻着汉篆的钱币历经了多次王朝更迭与地方政权的易主，但它一直在发行、沿用，见证了中国少数民族历时数百年的第一个“黄金时代”，成为了这七百年里中国民族融合、民族发展与民族进步的唯一见证者。

但在其后的初唐，“五铢”却被唐高祖废止，乃是因为它流通时间太长，造成了中国历史第一次灾难性的币制混乱——甚至有些人将五铢“剪边”，作为“两铢”来使用，严重动摇了中央政府的货币信用与金融秩序。因此，宋人用“治乱尽五铢”来概括“五铢”所反映的历史变革，诚哉斯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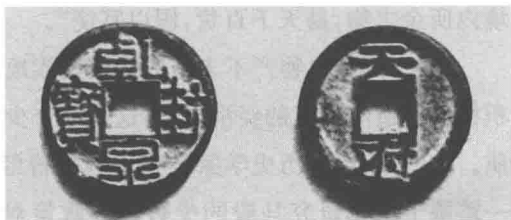
## 两朝风流一钱鉴

许多人都认为，唐朝只有“开元通宝”这一种年号钱，所以每当提到“开元通宝”时，几乎所有人都会想到气势万千的盛唐气象。

但实际并非如此，就在“开元通宝”发行后不久，由于发行量过大，竟然促进市场上短期内通货膨胀，长安城里许多人买日常生活用品都要拿着成袋的开元通宝铜钱往集市上去交易。没过多久，老百姓就嫌麻烦，开始直接用黄金白银交易，开元通宝被闲置了。

此时唐高宗已经将政权交给了武则天，武则天一方面深刻地检省了唐高宗缺乏事先调研、结果导致滥发货币的严重后果，一方面她考虑到通过货币来维护自己今后的统治威信，于是她决定，下诏停止使用“开元通宝”，改用新年号“乾封”铸钱“乾封泉宝”，以一当十。

乾封泉宝带来了比开元通宝更坏的结果，直接导致了币值面额过大，刺激了市场上进一步通货膨胀。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来看，市场上的货币总量并未减少，而只是货币的面额变大，犹如1949年之前国民政府以金圆券替代法币的做法一般，非但不能缓解通货膨胀，相反还增加了市场上的货币总量，仅仅几个月的时间不到，这枚有着时代意义的铜钱就陷入“谷帛腾贵，商贾不行”的地步，



八个月之后，高宗李治再度下诏，称“采乾封之号，改铸新钱。静而思之，将为不可”，于是果断废除了“乾封泉宝”，开始推行平抑物价，改善民生的政策。

历史往往会有这样的巧合，就在唐朝灭亡后不久的五代十国时期，作为十国之一的楚国（今湖南省境内），也发行了“乾封泉宝”作为当地的通用货币。历史记载“铸铁钱，围六寸，文曰乾封泉宝，以一当十”。背后有天、策、天府、天策等字样。马殷算是五代十国里的贤王之一，治理楚地时发展茶桑，井井有条，比春花秋月的李煜要有魄力许多。

现在我们看到流传至今的“乾封泉宝”，竟以马殷铸造的占绝大多数，究其原因，乃是因为此币在楚地发行量大之故。既然同为“当十”之币，当年盛唐时全国发行的总量竟然不如区区楚地一地的发行量？为何楚国开“当十”之风并未造成经济危机？为何“十国”其他小国发行的钱币，今日都很难见到？

当然，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唐朝发行“乾封泉宝”持续时间较短，但马殷却发行了数十年，但论国土面积来看，楚国的面积仅相当于唐朝国土面积的几十分之一。而时下我们时常能见到楚国的“乾封泉宝”，而唐代的“乾封泉宝”几乎一枚都见不到。唐与十国不过相去两百余年而已，究其原因何在？

笔者认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马殷治国的方略，而其中有个积极政策就是楚地能够因地制宜，采取“楚人治楚”的英明方针，重用当地少数民族首领，推行“以茶为本”的经济长板，短短几年时间里，楚地“以境内所余之物，易天下百货，国以富饶”。

在条件落后、物产不丰富的少数民族地区，敢于重用少数民族官员，积极选择适应该区的经济优势，这是一个少数民族地区管理者的基本素质。前些年，台湾历史学家桂齐逊教授曾经指导过一位学生，专门写了一篇硕士论文研究马殷的少数民族政策对当下的意义。可见作为“十

国”这个小朝代中“一国”的楚国，先前虽常为史家所忽略，但却在一千年之后的今天，有着新的历史意义。

无论是楚国还是唐代，都是中国历史上可圈可点的王朝。王朝有大小之分，对于唐代的文韬武略，我们早已有着深入的研究，但对于马殷的治楚国之策，却关注明显不足。时至今日，透过锈迹斑斑的“乾封泉宝”，不但可以窥得金戈铁马的大唐气象，对于广兴茶桑的楚国，亦有着别具一格的历史观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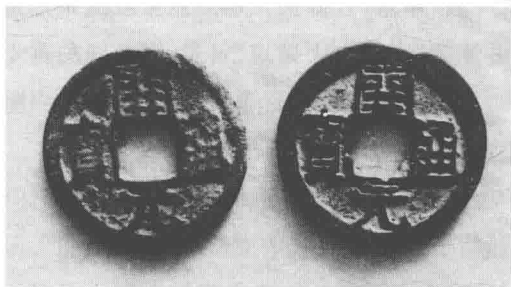
# 忆昔开元全盛日

“忆昔开元全盛日”是“唐朝乐队”代表作《梦回唐朝》中的一句歌词，最早语出杜甫的《忆昔》。开元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年号。我们常说的“开元”就是指的年号为“开元”的李隆基执政年间。后人多半用“开元全盛日”来指代唐朝这个恢宏、壮阔、富庶的年代。

但是我们所熟知的“开元通宝”，却与唐玄宗的开元盛世关系不大。五铢盛行七百年之后，唐高祖袭隋大业，再度统一中国。但当时五铢已经到了日积月累、混乱不堪的地步。据说，在唐初的市场上，极少数的汉五铢竟然还在流通，金融秩序大大受到了损害。

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现在还在用南宋的“交子”到超市里购物——假如那张纸的质量非常好的话。但是对于一个国家的中央统治者而言，这样混乱的币制若不整顿，唐朝必然也会像隋朝一样，一夜间倒台。

因此，“开元通宝”四字大有讲究，所谓“开元”，就是“开辟新纪元”，而“通宝”则是“流通的宝物”。两个词合起来的意思就是“开辟新纪元之后的流通宝



物”。意味着在唐代，“开元通宝”犹如秦半两、汉五铢一样，可以在一个新的时代流通到全国各地。

我们知道，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全盛的时代。民族融合、共同发展达到历史的空前值。当然，我们可以将这些成绩认为是南北朝、十六国时期民族融合的结果。文成公主和亲、与西域地区通商、北征高丽等等，不胜枚举。事实上，大唐文化就是一个多民族的融合文化。譬如唐高祖李渊的母亲、妻子都是北方少数民族，长安城里居住着无数个不同民族的居民，而“诗圣”李白就有哈萨克族血统。

唐代的统治集团实际上是一个多民族的融合体。譬如我们熟悉的“门神”尉迟恭就是羌人，刘宏基、窦抗等人都是匈奴族出身，而丘行恭则是鲜卑人。瓦岗寨的“大肚子天王”史大奈原名“阿史那大奈”，单看名字就知道，乃不折不扣的突厥人。

事实上，“开元通宝”果然不负唐高祖的期望，从东北的高句丽、百济到西南的骠国、吐蕃，从西北的龟兹、回鹘到波斯，到东南的澎湖、琉球，甚至日本、爪哇与星罗，都有“开元通宝”流通的影子。“流通之宝物”到达空前的顶峰，远超越了昔日的半两、五铢，成为了中原民族与边疆少数民族乃至境外诸民族交流的重要工具。

唐朝重视少数民族发展，实行积极的少数民族政策。唐太宗李世民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依朕如父母。”由是可知，唐代主张“均衡发展、共同富裕”的民族政策是极其开明、非常有凝聚力的。时至今日，我们重新思考唐朝的民族政策，显然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早些年读到过一篇新闻，据说在西亚某国挖掘石油时，忽然掘出古币多枚。上面的字迹已经斑驳，偶然可以辨识。但由于当地的工人与记者均不谙币上文字，报道竟称这些古币“来源于某不明国家”，一时众说纷纭，以讹传讹最终以为奇闻。实际上铜钱上的四个字就是“开元通

宝”，出自大书法家欧阳询的笔下。此事虽近似传奇，但足以见得当时民族融合、文化交流之繁盛，早已超越国界了。

因此，“开元通宝”是整个唐代“大盛世”的见证，也是当时多民族共同发展的见证。现在“开元通宝”依然是市场上最不值钱的古币之一，原因在于它发行时间长、分布地域广、发行量大。甚至在西亚一代都可以作为通货使用，可见“开元通宝”在当时的亚洲几乎成为了犹如今日欧元的地区通用货币。

从这个角度来看，唯有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才能做到这一点，而这又依赖于唐代有别于先前诸朝代的民族政策与“五胡十六国”的民族大融合。今日的“开元通宝”，虽然已经锈迹斑斑，但我们仍能感受其厚重的手感，而这无疑与三百年的大唐盛景有着无法割裂的联系。

# 太平之后,不再太平

唐代之后的“五代十国”堪称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乱局,都说乱世出英雄,出身后周将领的宋太祖就是其中之一。陈桥兵变,统兵千人的禁卫军“都点检”转眼间黄袍加身成了皇帝,所以他特别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政权。

通过对五代十国民族大迁徙与唐覆灭的经验教训的吸收与总结,宋太祖发现,中原政权的盛衰,与边疆少数民族关系的好坏相映对。因此,宋太祖在建政之初,特别注意对西北民族政策进行调整。主张以“怀柔”为主,提出“不急于边疆之功,以爱民安人为上急而已”的观点。重用少数民族党项拓跋氏家族,继续册封其为“定难节度使”,以维护西北地区的安宁,甚至还要求“所部州县莞榷之利悉与之,资其回图贸易,免所过征税”。种种惠及少数民族的定边良策,为新政权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和谐的空间。

宋太宗继位后,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态度急剧转弯,从怀柔之策变成了靠战争解决问题。他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宣称“戎心反复,盖其常尔”,甚至将少数民族“以禽兽畜之”,这样带有民族歧视的荒谬观点出自于一位中原政权的皇帝之口,其民族政策亦可想而知。

果不其然,西北少数民族在这种歧视与压迫下纷纷举义造反。甚至一向与宋朝关系不错的党项拓跋氏家族也与宋太宗反目为仇,自立“西夏”王国。在拓跋氏的带动下,其余的少数民族纷纷选择了“脱宋”而自



立门户。一时间，西北边陲狼烟四起，宋太祖苦心经营多年的边疆稳定局面，结果一朝毁于宋太宗这个庸君之手。

宋太宗为了表示出自己与太祖的不同，遂改国号为“太平兴国”，并铸造了宋代第一枚年号钱“太平通宝”，意图

以新政来建立一番功业。结果新政颁布，功业却差之千里。在“太平”年间，宋太宗发动了好几场大大小小的与少数民族的战争，北击西夏（今宁夏），南打交州（今越南），但如白马岭战争、满城之战与白藤江之战等等，不但宋王朝没有捞到半点便宜，相反那些曾经归属宋朝的少数民族政权纷纷独立，在战争中希达里、侯仁宝等名将也先后捐躯——纵然有杨业的雁门关大捷，也无法扭转至此以后宋朝将处于“少数民族政权大包围”的局面当中。

果不其然，“太平”之后，宋代陷入内忧外患之境。从王安石变法开始，如何对待边疆少数民族政策的争议在朝野中始终没有统一意见，是缴纳岁币还是战争？是割地求和还是拼死一战？大家谁也下不了定论，最终形成了导致北宋灭亡的“党争”，而少数民族地区又多次自立政权：辽、金、西夏、南诏、大理……不胜枚举，使中央政府处于如此错综复杂的被动局面，以至于宋徽宗、宋钦宗被金军俘虏，直接导致北宋亡国，宋太宗应负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因此，“太平兴国”铸造的“太平通宝”，竟然预示着“太平”与“兴国”均成为了大宋王朝不可实现的梦想。北方的少数民族借此强盛起来，使

得元、清两朝均为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政权，这在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但从大历史的角度来，宋太宗的昏聩之举，又为北宋之后的民族大融合提供了政策上的空间。

“太平”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统治者的梦想，也是中国人念兹在兹的愿望。“乱离人，不及太平犬”让所有中国人都恐惧战争，害怕背井离乡、妻离子散。但中国的历史、文化与社会决定了：“太平”的前提就是民族问题。如果一朝统治者无法将民族问题和谐、有效地进行解决，那么“太平”终将是一张空头支票。

值得一提的是，清末小刀会首领刘丽川也曾上海铸造过“太平通宝”的钱币，但由于小刀会影响有限，这些钱币现在也寻不着踪影。刘丽川本人是中医出身，不谙谋略，更不懂治国，所以小刀会也不过是历史长河里飞过的一只孤鸿而已。而近年来又有一家网络银行，竟也给自己命名为“太平通宝”，当然此四字与宋太宗的“太平通宝”可谓相差千里，但可见“太平”二字从北宋至今，始终深入人心，未曾有所遗忘。

## “澶渊之盟”与天降祥符

从历史的角度讲，宋代是一个不太好的王朝。在中国历代王朝中，像宋代这样窝囊的，不多；但从文化的角度看，宋代又是一个相当不错的王朝。瘦金书、清明上河图、宋词，凡此种种了不起的文化创造，皆在宋代呈现，就连平庸无能的宋真宗，都吟出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千古名句。西方历史学家认为“国家愈强大，文化愈发达”，这条定律在有宋一朝，不攻自破。

史家公认，宋太宗执政几年，虽亮出“太平兴国”的年号，但外患使其不太平，内忧又难以兴国，驾崩前几年，宋王朝几乎到了江河日下、气数将尽的岁月。宋真宗即位之后，以新近崛起的辽国为代表的北部少数民族政权，开始盘算对内地进行反攻，期望有朝一日能颠覆宋王朝，进而入主中原。

宋太宗时“杨家将”在抵御北方侵略时，确实扮演着颇为重要的角色。在太宗驾崩前，曾一度命令潘美、杨业带兵北伐，史称“雍熙北伐”，结果反倒是让杨业被俘身亡。自此之后，辽国获得中原以北的实际统治权。这样的打击让宋真宗畏辽如虎，执政之初，就定下基调：在澶渊一地（今河南省濮阳）与辽修和，签订“澶渊之盟”。

这种“修和”事实上是“花钱买太平”的策略。每年中央政府向辽国政权缴纳“岁币”，并认辽国萧太后为“叔母”。这样的城下之盟在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看来，皆属最为耻辱之事，但宋真宗却不这样认为，“澶

渊之盟”签订后，宋真宗以为真的可以高枕无忧、安享太平了。但“澶渊之盟”确实太耻辱，让宋王朝为千夫所指，连宋真宗都不好意思用任何理由来粉饰太平。于是，在另一位宰相王钦若的策应下，宋真宗开始了他一生中“最光辉”的政治把戏。



某日上朝时，宋真宗忽然告诉群臣。几个月前，他曾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神人告诉他“一月三日，应在正殿建黄箓道场，到时会降天书《大中祥符》三篇，勿泄天机！”一语毕，满朝文武哗然。这时，忽然有太监跑进皇宫，称果然在道场上看到天书，此乃天佑明君的祥兆。于是，宋真宗竟改年号为“大中祥符”，发行货币“祥符元宝”——钱币上的“祥符元宝”四字，便出自宋真宗之手。

在一个封建王朝里，皇帝的新衣是不会有人揭穿的。借神鬼之言粉饰太平，已然是无耻之尤，然而将这种虚妄的假话作为年号，公开在货币上刻印，而且皇帝还亲手题词，更是世所罕见。这种事情恐怕古往今来只有宋真宗做得到。

“澶渊之盟”签订之后，宋王朝遂一蹶不振，但与此同时，辽国也开始走下坡路，这是许多历史学家感到好奇的一点。其实原因很简单，在修和之前，两国处于时战时和的状态，不断在摩擦中获得竞争与文化、经济上的碰撞，而且使得辽国不断与北方其他少数民族政权合作、交流，使得整个中原以北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局面。历史地看，这是一种良性的民族互动，促进了双方的共同发展。